

《列子》伪书说述评

管宗昌

(大连民族学院 文法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05)

摘要: 历代陈陈相因的“伪书说”已经成为研究《列子》的严重障碍。“伪书说”不少,但实际上,这些“伪书说”有几个因循的关节性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历代的“伪书说”在态度和方法上却存在诸多缺陷。我们应该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伪书说”和《列子》。

关键词: 伪书说; 态度; 方法

中图分类号: B2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6)05-0011-06

《列子》一书经西汉刘向整理定著之后,流传一直不甚广泛。东晋张湛其“先君”曾将之当作“奇书”收藏,永嘉之乱时散落。乱后,张湛“先君”再次辑全,张湛为之作注才使这部著作得以流传至今。(有关记载见于张湛《列子注序》)

“伪书说”从唐代柳宗元《辩列子》发端。而实际柳氏也并未断言《列子》为伪,只是对其中几点略有疑问。但是柳宗元的质疑却引来了后代不少极端化的呼应,从宋代高似孙《子略》始,同时代附和高的仍有朱熹、黄震和叶大庆诸人,至明代有宋濂等人,但是人数还不算多,到了清代则有陈旦、钱大昕、姚际恒、姚鼐等多人,近代以后的代表人物有马叙伦、梁启超、吕思勉、陈三立等人以及古史辨派,已经形成了《列子》研究的严重障碍。

综合分析诸“伪书说”,其证据可以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从《列子》作品的外围入手考察《列子》书,如“太史公不为列子立传”,“列子反映的是魏晋时的思想”等,二是从《列子》文本入手考察其文句、用语、具体名物制度等,得出这些证据不属先秦的结论。本文重述第一类证据。

本文认为谈《列子》的流传问题涉及到如下几个环节性的问题,而这几个问题也正是“伪书说”反复沿用的重心所在,因而往往牵涉多个“伪书说”,但其中有一个可为此类观点的典型与代表,因而这些在环节问题上的典型的“伪书说”也就成了澄清《列子》流传的关键所在。现将几个环节性问题爬梳如下:

1. 今传《列子叙录》中列子的年代有疑问

这一点从柳宗元发端反复为历代伪说者沿用。柳氏在《辨列子》^①中说:

刘向古称博及群书,然其录列子,独曰郑繆公时人。繆公在孔子前几百岁,《列子》书言郑国皆云子产、邓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记》郑繆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围郑,郑杀其相驷子阳,子阳正与列子同时,是岁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韩烈侯、赵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齐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鲁繆公十年,不知向言鲁繆公时遂误为郑耶?不然,何乖错至如是?

具体言,柳氏这一怀疑是有道理的,根据《列子》书的内证,有列子辞子阳粟事,列子应与子阳并时。刘向《列子叙录》所载“郑繆公时人”确与此内证有歧误,但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是刘向的讹误导致,并且也并未以此疑《列子》为伪。

而[宋]叶大庆与[清]姚际恒可谓积极响应,把这一论述当作《列子》为伪书的一大证据。

如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②中说:

则向之序亦安知不为其人所托而传乎?夫向博及群书,不应有郑繆公之谬,此亦可证其为非向作也。

可以看出,姚氏认为“繆”、“繆”之谬是难以理解的,他否认《列子》,并且进而怀疑到《列子叙录》的真实性,所以他又进一步断定《列子叙录》并非刘向之作。

2. 太史公不为列子传

最早以此作为伪书证据的是宋代的高似孙,其在

收稿日期: 2005-07-15

作者简介: 管宗昌(1979—),男,山东潍坊人,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① 杨伯峻《列子集释·附录三》,北京 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287页。

② 杨伯峻《列子集释·附录三》,北京 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293页。

《子略》^①中说：然观太史公史殊不传列子，如庄周所载许由、务光之事。汉去古未远也，许由、务光往往可稽，迁独疑之；所谓御寇之说，独见于寓言耳，迁于此诎得不致疑耶？

[清]姚际恒在其《古今伪书考》中曾摘引此段，对之表示深信与赞同；马叙伦在《列子伪书考》中也对之深表赞同，他说：“列子在庄子前，庄子称之，使其书颇行，景帝时太史公安得以寓言与《列子》相类而不称？”。

与这一推理方式相类的伪书说证据还有“《庄子·天下》不叙列子”。宋代高似孙在其《子略》中说：

周之末篇叙墨翟、禽滑釐、慎到、田骈、关尹之徒以及于周，而御寇独不在其列。岂御寇者，其亦所谓鸿蒙，列缺者欤？

没有明辨其原因，在他们看来，太史公或庄周没有为之立传或对之加以叙述便足以说明此人是并不存在的。

在这三种代表观点中，高似孙《子略》可以用为本环节问题的典型观点。

3. 诸伪书证据中最常为伪书说者延用的是：《列子》书中表现了不可能出现于先秦时代的佛家思想

沿用这一说法的有高似孙《子略》，黄震的《黄氏日钞》，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宋濂的《诸子辩》，钱大昕的《十驾斋养心录》，陈三立的《读列子》，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马叙伦《列子伪书考》等。这一证据主要从《周穆王》篇着手，如姚际恒在他的《古今伪书考》中说：

至其言西方圣人，则直指佛氏，殆属明帝后人所附益无疑，佛氏无论战国未有，即刘向时又宁有耶！

马叙伦在《列子伪书考》^②中指陈列子伪书的“二十事”，其中第五事便是针对《周穆王》篇：

五事，《周穆王》篇有驾八骏见西王母事，与《穆天子传》合。《穆传》出晋太康中，列子又何缘得知？或云《史论》略有所载，然未若此之诡诞也。盖汲冢书初出，虽杜预信而记之，作伪者艳异矜新，欲以此欺蒙后世，不寤其败事也。高似孙在《子略》中说：

至于“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故有及于佛，而世犹疑之。“天毒之国纪于《山海》，竺乾之师闻于柱史”，此杨文公之文也。佛之为教已见于是，何待于此者乎！

黄震在《黄氏日钞》^③中说：

今考辞旨所及，疑于佛氏者凡二章。其一谓周穆王时西域有化人来，殆于指佛。……其一谓商太宰问圣人于孔子，孔子历举三皇五帝非圣，而以圣者归之西方之人，殆于指佛。……使此言不出于列子，则晋人好佛，因《列子》多诞，始寄影其间，冀为佛氏张本尔。

如此证据陈陈相因，反复沿用，认真辨析尤为重要。

总结上述几种代表观点，马叙伦说和姚际恒说可以为此说的典型观点，他们立论的根据是：《周穆王》篇与《穆传》有合节之处，但《穆传》晚出，且其中“西方圣人”是指佛氏，佛氏亦晚出，由此则《列子》晚出。

4. 《列子》中出现了晚于列子的人物

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仍然是柳宗元，他在《列子辨》中说：“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后，不可信”，其后，这一点成为历代伪书说反复沿用的证据。叶大庆受到启发，在其《考古质疑》^④中又找出《列子》中宋康王、公孙龙事为其疑张本：

而宋康王事又后于公孙龙十余年，列子乌得而预书之？信乎后人所增有如张湛之言矣。然则刘向之误，观者不可不察；而公孙龙、宋康王之事为后人所增益，尤不可以不知。

但从根本上讲，柳宗元和叶大庆并没有完全认定《列子》为伪，而是认为其中杂以后人所增益。宋濂变本加厉，将《列子》书认定为后人荟萃而成，其在《诸子辨》^⑤中说：

书本黄老言，绝非御寇所自著，必后人会萃而成者。中载孔穿、魏公子牟及“西方圣人”之事皆出御寇后。

这一点也成为《列子》真伪问题的一层迷云。

5. 《列子》剽窃了其他古籍

《列子》中有的文字与其他古籍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主要是《庄子》和《易纬·乾凿度》，《列子》与《庄子》重文处（包括语句完全相同者，个别字句不同、个别字词写法不同但表述与大意相同者）一共17处。《列子·天瑞》的一段论述与《易纬·乾凿度》重文。

只有一部分伪书论者认为是《列子》剽窃了其他古籍，但仍有许多人包括一部分伪书论者或怀疑《列子》的学者则认为是其他古籍引用了《列子》。认为

① 杨伯峻《列子集释·附录三》，北京 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288页。

② 杨伯峻《列子集释·附录三》，北京 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301页。

③ 杨伯峻《列子集释·附录三》，北京 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290页。

④ 杨伯峻《列子集释·附录三》，北京 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289-290页。

⑤ 杨伯峻《列子集释·附录三》，北京 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291页。

《列子》剽窃者包括宋濂《诸子辨》、陈旦《〈列子·杨朱篇〉伪书新证》、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马叙伦《列子伪书考》。诸说多为直接做出判断，很少有证据罗列，而稍有“证据”者梁启超说^①可为代表：

凡伪造的不能不抄袭旧文。……又如《庄子》和《列子》相同的，前人说是《庄子》抄《列子》。前人已经过《庄子》不是抄书的人，现在又可从文法再来证明。《庄子·应帝王》篇曾引壶子说：“渊有九名，此处三焉。”大约因衡气机很难形容，拿这三渊做象征。但有三渊便足够了。伪造《列子》的因为《尔雅》有九渊之名，想表示他的博学，在《黄帝》篇便说：“……是为九渊焉。”竟把引书的原意失掉了，莫是弄巧反拙？谁能相信《列子》在《庄子》之前呢？

梁说认定《列子》抄袭的关键是：《列子》的“九渊”之说没有弄清“三渊”对于论述就足够了，反而为了表示博学把“九渊”都列出来。

6.对刘向《列子叙录》的怀疑

刘向《列子叙录》是研究《列子》流传最早的证据之一，它记载了当时刘向定著《列子》之时此书的基本情况，意义不凡。也正因此，一些伪书说者在此大做文章，将《叙录》也斥为伪作。

如：陈旦在《〈列子·杨朱篇〉伪书新证》^②中说：

刘向校录云：“《穆王》、《汤问》二篇，迂诞诡诞，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实则向叙乃伪造《列子》者假托以见重，而又故设此迷离恍惚之辞，以乱人耳，由今考证，《力命》、《杨朱》两篇，同出一源，其蜕化袭取之迹，固斑斑可考也。

马叙伦在《列子伪书考》“二事”中说：

汉初百家未尽出，太史公未见列子书，不为传，何伤？顾云，孝景时，其书颇行，则汉初人引《列子》书者又何寡也？太史公安得以寓言与《庄子》相类，而不称？斯则缘其剽袭庄生，用为弥缝者也。

陈氏之说较为明了，直接否定《列子叙录》；马氏之说否定《叙录》的关节在于：《叙录》中讲其书“颇行”（马氏意为“很流行”），而汉初引之者甚少。这在马氏看来有悖常理。

7.对张湛注前序文表示怀疑

具体而言，就是怀疑张氏伪造此书，怀疑者有梁启超、黄震诸人。黄震在其《黄氏日钞》中说：

其书八篇，虽与刘向校雠之数合，实则典午氏渡江后方杂出诸家。

梁启超在其《古书真伪及其年代》^③中说：

譬如《列子》乃东晋时张湛——即《列子注》的作者——采集道家之言凑合而成，真《列子》有八篇，《汉书·艺文志》尚存其目，后佚。张湛依八篇之目假造成书，并载刘向一序。

吕思勉在《列子解题》^④中说：

此书前列张湛序，述得书源流，殊不可信。而云“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大同归于老、庄”，“属辞引类，特与《庄子》”相似。《庄子》、《慎到》、《韩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指归》，多称其言”，则不啻自写供招。湛盖亦以佛与老庄之道为可通，乃伪造此书，以通两者之邮也。篇首刘向语，更不可信。

等等诸如此类的观点大同小异，他们根本不相信张湛的序文，他们认为《列子》是张湛伪作，又特意写这样一篇序文乱人耳目，并进而推定刘向的叙录也是伪作。

如上观点，梁氏观点并无任何理由，吕氏与黄氏且有“理由”，吕氏观点可看作此类观点的典型。他的“理由”首先是得书源流殊不可信；其次，张氏说《庄子》等多称其言其实是自写招供；再次，张氏说“与佛经相参”是自写供招，则《列子》书中有佛家思想。

这七个环节性问题是历代伪书说立论的最为重要的依据，也是他们反复沿用的观点。

二

通过以上对历代伪书说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基本规律：

首先，伪书论者和伪书证据由少而多。疑《列子》之风始自唐代柳宗元，宋代有朱熹、高似孙、叶大庆、黄震诸人，明代有宋濂诸人，清代及近代以后则有姚际恒、马叙伦、陈旦、梁启超、李慈铭、俞正燮、姚鼐、钱大昕等等。这支队伍可谓是日渐壮大。

从伪书证据看，唐宋时主要立足于列子其人的有无和时代问题以及书中的佛家思想问题立论，认为书中出现的人物以及表现的思想在时间上有歧误。明清时期，伪书证据进一步扩大，开始延及了和《列子》相关的一些资料文献以及人物，具体讲，就是刘向的《列子叙录》以及东晋时期为此书作注的张湛，都被列入了伪书证据的范围。

其次，伪书程度由浅而深。柳宗元初疑之，只是

① 杨伯峻《列子集释·附录三》，北京 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300-301页。

② 杨伯峻《列子集释·附录三》，北京 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316页。

③ 杨伯峻《列子集释·附录三》，北京 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299页。

④ 杨伯峻《列子集释·附录三》，北京 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308页。

认为其稍有增窜,如“《杨朱》《力命》疑其杨子书”,“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后,不可信。”另外,对列子年代存在的问题只是推断为字误,而没有指出其伪。严格讲,柳宗元并没有认定其为伪书。宋代高似孙认为其为“后人荟萃而成”,叶大庆认为其为“后人增益”,都没有明确认定《列子》为伪书,但是至清代以及近代,姚际恒、马叙伦诸人直接定其为伪。姚际恒有《古今伪书考》考之,马叙伦专著《列子伪书考》列其伪书证据数条。

这些伪书论者和伪书证据看似驳杂,但是其中是有规律可寻的。我们且不论《列子》其书本真若何,单论历代之“伪书说”,其有如下几个特点:

1.有几个环节性的问题反复为历代伪说者沿用。这也正是本文第一部分所梳理出的几个环节性问题,这几个环节性问题虽然不是伪说者立论的全部依据,但是历代的伪书说者反复沿用的十分重要的依据,因而同时这也就是廓清《列子》研究道路、复还《列子》本真所要考察的关键所在。

2.细加分析,历代“伪书说”在态度上和方法上有相近之处,郑良树先生曾指出伪书论者经常存在的缺失:“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态度和方法。在态度上,有些学者感情用事、成见太深、主观太强,以‘每辨必伪’‘逢书必假’为一逞快之事;在方法上,有些学者过分‘粗心大意’、‘跳级论证论’强不知以为知。”^①

确如郑氏言,《列子》伪书说也正存在这两方面的问题:

在态度上,许多伪书说论者存在先入为主的态度,即先认定《列子》为伪书,而后再搜罗“证据”支持其说,或直接没有任何证据和论证。

伪书说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缺乏系统深入地论证和具体的论据,很多结论往往是感受性的或者是直接得出的。这当是那个时代学术的总体特点,但是我们今天在面对前人结论的时候则不得不考。这在古史辨派处则尤为明显,梁启超论定《列子》为张湛伪作以及刘向叙录为伪,均无任何证据言。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列子》一书,后人所缀辑,盖出于东晋以后,观湛所述甚明,本非汉志之旧。”更是推断。历代《列子》伪书说中此类情况不在少数。

即使稍有“证据”者,很多都有“先入为主”的问题存在。如本文第一部分所理第二类证据即是如此,在他们看来,太史公或庄周没有提及列子便意味着此人不存在,而太史公和庄周所提及或所传只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仅有的几人而已,伪书论者没有研究

太史公书和庄周书的立传原则,便以如此证据得出结论显然是十分随意和荒谬的。又如梁启超之论证《列子》剽窃《庄子》文,他认为《列子》的“九渊”之说没有弄清“三渊”对于论述就足够了,反而为了表示博学把“九渊”都列出来。这个理由实在太不充分,对于这一点现代学者严灵峰曾仔细比对、严格论证,并且得出结论:“不问二书如何互相错杂,俱足证明,《庄》袭《列子》;不当谓《列》在《庄》后也。”^②本文不对孰先孰后判断,但就其态度言,梁说已经是典型的“先入为主”了。

在方法上,伪书说往往存在越级思维、自相矛盾、偷换概念、循环论证等一系列问题。

现举例说明如下:

姚际恒、马叙伦在论证《列子·周穆王》篇为晚出时,曾以《穆天子传》为参照,他们认为《周穆王》篇所记和《穆天子传》“若合符节”,而《穆天子传》为晋太康汲冢书,由此推定《周穆王》篇为晚出,实际上,稍有考古常识便不应该如此草率定论。其实“若合符节”也应该说明《周穆王》篇时代应近于或早于穆传入冢时代,即战国魏惠成王之子的时代,因为穆传入冢之前就已流传或产生一定影响是完全可能而合理的。与这种论证方式相近的仍有马叙伦等人以《山海经》晚出论《列子》晚出。也属于同样的情况。

在同一问题论述中也犯有“偷换概念”的错误,比如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中说:“至其言西方圣人,则直指佛氏”,其实本论断本于《周穆王》篇“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的记载,姚氏将“西极之国”和“化人”的概念偷换成“西方”和“圣人”,如果细加研读,便不难发现《周穆王》篇之“西极之国”并非佛教所指“西方”,“化人”与“圣人”或佛教中的“化人”概念也相去甚远,关于这一点拙文《〈列子〉中无佛家思想》(载《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有论。

有时,伪书论者在“先入为主”的态度之下造成论证自相矛盾而全然不知,只要我们保持头脑冷静便会一目了然。陈旦在论《列子叙录》为伪时就明显犯有这样的错误。根据陈旦所论(引文前文已引,此略),陈旦认为《叙录》所说《杨朱》、《力命》“二义乖背”并不符合事实,他认为《杨朱》、《力命》实出一源,《叙录》所云与《列子》实况是有歧误的,那么《列子》与《叙录》不应该是同出伪造者之手,而陈氏结论是“向叙乃伪造《列子》者假托以见重,而又故设此迷离恍惚之辞,以乱人目。”所以陈氏此说完全是逻辑混乱、自相矛盾的。原因就是论者的主观态度过

① [香港]郑良树《古籍真伪考辨的过去与未来》,载《文献》1991年第2期,第255页。

② 严灵峰《辨列子书不后于庄子书》,载《无求备斋列子集成》台北台北艺文印书馆1971年版,第369-398页。

于强烈，一方面要否定《列子》，所以说《叙录》是“设此迷离恍惚之辞，以乱人目”，另一方面还想否定《叙录》，所以又极力寻找其中的歧误，不想论证中两者正自相矛盾。

再者，循环论证也是伪书论者常用的手法。比如，伪书论者常以刘向《列子叙录》为伪作为《列子》为伪的一个重要证据，但是这一证据同时又是“《列子》为伪”的结论。陈旦、马叙伦诸人“实则向叙乃伪造《列子》者假托以见重，而有故设此迷离恍惚之辞，以乱人耳”之类的论断，即是在认定《列子》为伪之后，任意推断向叙亦是伪造者为乱人耳目而伪造，用以证明《列子》为伪，并成为了反复沿用的证据之一。关于向叙非伪，马达先生曾有专文论述（题名：刘向《列子叙录》非伪作，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90-94页）。

再如，对张湛注前序文的怀疑也是循环论证的例子，细研吕思勉的论述实无任何确定之证据，所说“源流不可信”所说“《庄子》等称其言，与佛氏相参，为自写招供”等，只是一己推断，而其根源是不相信张湛。为什么不相信张湛？因为认为《列子》是伪书（不是找到了确定的证据）。所以这一观点又进入了一个循环论证的圈子。

莫论向叙与张注真伪，本文只拟指出此类论者态度与方法上的失误。而总结上述态度与方法，“伪书说”出现的诸多失误其基本原因是“先入为主”的态度。

三

总之，对于古籍的考辨在态度上要平实，在方法上要严密，在论证上要周备，在论断上要谨慎，这样才能真正得出合理的结论，才能还古籍以本来的面目。

还古籍以本来的面目远比简单的“真”或“伪”的名分重要的多。古籍的情况十分复杂，简单的“真”或“伪”往往难以全面描绘古籍的本来面目，况且，对于“真”或“伪”的标准在某些古籍上并不适用。杜泽逊曾将伪书定义为：“一书的公认著者及时代并非这书的真正著者及时代”^①，但是在许多文献特别是先秦诸子书处本标准并不完全适用。先秦诸子书的著作权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而且也早有人省及此事，清代的孙星衍在《燕丹子序》中说：

古之爱士者，率有传书。由身设之后，宾客记录遗事，报其知遇，如管、晏、吕氏春秋皆不必其人自著。

严可均《管子后》（见《铁桥漫稿》卷八）云：

近人编书目者谓此书多言管子后事，盖后人附益者多，余不谓然。先秦诸子，皆门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撰定，不必手著。

近人余嘉锡先生的见解^②也是十分令人信服的：

古书多无大题，后世乃以人名其书。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及其偏次成书，类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因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

正如诸先生言，先前诸子书多为门派之作，显然用机械的方式断定其著者与时代就很难看清其本来面目。针对《列子》书，我们完全可以认定其作者并不是或不完全是列子，这样至于许多关于《列子》中出现了魏牟、孔穿之类列子之后人物的责难我们就十分清楚了。

总之，《列子》的真伪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就现今研究现状看，已经有许多学者认识到了历代伪书说存在的某些问题，但是仍然未能还其本真，真伪问题仍然是《列子》研究道路上一个巨大的障碍，这样就需要我们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方面是认真分析甄别，以平实的态度严谨的作风力争还其本真。面对《列子》书存在的历史问题，应该静心加以梳理，而不应该踩在前人的脚印上简单的将《列子》一棍子打死或者简单的完全肯定，而应该进行认真地分析甄别，从而启发我们对《列子》的辨析，力争还其本真。但是，这只是问题的第一步，这很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可能是一场争执不清的笔墨官司，但同时又是必需的。《列子》的研究现状或多或少的向我们预示了这一点。伴随历代伪书说的仍有不少的“真书”说，但势头显然败于伪书说的下风，近年，《列子》研究又有重兴之象，“当代学者所撰文中仍在考辩的大约占60%以上。”^③，当然“真书”说势头更盛。但是单从历史就不难看出，这必将仍然是一场长期的“争论”，或者其中一方还原了《列子》的真相，或者更可能仍会持续。

所以，这就需要在《列子》的研究上作出另一方面的努力：开阔思路，寻找全新的研究思路。

在对待《列子》本真如何的问题上，对已有的历史问题加以清理是必要的，但又是不足的。李学勤先生的一点建议倒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发：^④

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

①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 中华书局 2001年版，第226页。

② 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第30页。

③ 管宗昌《〈列子〉研究综述》，载《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32页。

④ 转引自[香港]郑良树《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1年版，第273页。

缚。在现有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我们要讲理论，也要讲方法。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不能做到的。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

可谓良策，但是考古又可谓“可遇不可求”。这样本文又有一构想可乞教方家：积极致力于《列子》自身思想和价值的开掘。

关于这一问题有两层面含义：一是对伪书应该有全新的认识。我们千万不可视伪书为洪水猛兽，认为伪书一无可取，采取全盘否定的方式是不可取的。伪书只是我们对古籍的一种界定，即便是伪书也是古

籍，它承载着古籍的价值，所以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完全可以进行正常的研究和利用。二是对于《列子》思想和价值的开掘我们完全可以打开思路，暂且不顾虑其真伪问题，在研究的过程中充分开掘材料的价值。这样我们一方面可以对《列子》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比如：其思想体系、其名实观、其梦理论等）不致使我们的目光为考辨所局限，在当前条件下最大限度发挥古籍的价值。另一方面，这也是我们打开思路进行考辨的有效方式。通过对文本的深入研究也使我们更能把握《列子》的时代、思想承继、与其它史料的参照等基本问题。这无疑是进行考辨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所以，打开思路、灵活地、最大限度地开掘《列子》的价值，是下一步《列子》研究的方向。

The Commentary of The Viewpoint that *Lie Zi* Is A Book Dubiously Authenticated

GUAN Zong-chang

(Dep.of Chinese and Law 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600,China)

Abstract: The stale viewpoints that *Lie Zi* is a book dubiously authenticated have become serious obstruction of *Lie Zi* study. Although numerous,these viewpoints,in fact, share several central points,on which lots of attitude and method defects lies in these viewpoints. We should treat these viewpoints and *Lie Zi* with correct attitude and method.

Key words: viewpoints of book Dubiously Authenticated; attitude; method